

目錄

圖表目錄 / ix

中文版序 / xiii

中文版致謝 / xxi

導言 婦女報刊、女性主義與新聞媒體空間 / 1

1 國民母、女國民、女界革命：多聲的女性主義話語
(1898–1911) / 27

2 民國初期的婦女報刊與女子參政運動 (1911–1915) / 97

3 婦女報刊與新女性的言論與實踐 (1915–1923) / 159

4 國民革命中的婦女運動 (1924–1929) / 233

5 捍衛女性的公共生活 (1930–1937) / 293

結語 / 357

參考文獻 / 363

索引 / 381

導言

婦女報刊、女性主義與新聞媒體空間

中國自1898到1937年間經歷了從傳統帝制到現代國家的重大轉型過渡，無論是政治體制、經濟結構還是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在中國現代國族主義意識逐漸形成的這一時期，新聞報刊業也經歷了從初興、發展到繁榮的過程。新聞報刊不但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變遷、改良、動蕩和革新，也深刻影響了公共輿論的形成和民眾對國族問題和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意識。近代中國新聞業的發展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知識階層女性不但作為筆者進入主流新聞媒體，她們還創辦了婦女報刊。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女性在人文薈萃、風氣開通的上海創辦了第一份完全由女性主筆和編輯的報刊《女學報》，以提倡婦女權利，討論女子教育、職業、婚姻和男女平等。很快，其他中國婦女報刊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問世：上海的《女報》、《天足會報》、《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神州女報》等；北京的《北京女報》、《中國婦人小雜誌》、《中國婦女會報》等；以及留日中國女學生

在東京創辦的《天義報》、《中國新女界雜誌》等。這些女性刊物共同致力提倡女性的自由平等、經濟獨立和家庭革命。此後的幾十年間，婦女報刊在中國主要城市中的數量不斷增加。一批優秀的知識女性成為了婦女報刊的編輯、主筆和出版人，在公共領域中建構了多樣的女性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 和女性主義話語 (feminist discourse)，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啟發並引導中國女性走出家門接受教育、參與社會生產，並從事國族運動和婦女解放。

在此期間，女報人、主筆和編輯帶著鮮明的女性主義意識來編撰報刊，站在女性立場發表她們對政治、社會和女子問題的看法，倡導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討論國族問題，點評時事和報道新聞。婦女報刊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讓女性可以討論家庭和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問題，並將目光投向中國以外的世界，對中國女性的思想啟蒙和性別意識的形成實屬功不可沒。女報人不僅是女性讀者的精神導師、傾訴對象，還是她們尋求援助的源頭和女性社會角色的榜樣。當不同的國族主義話語在新聞媒體中激烈探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可能路徑時，婦女報刊為我們保留了女性的公共書寫，反映了女報人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女性主義問題的看法和反應，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中國早期女性主義的寶貴資料。在1898到1937年間，中國各地曾經出現過數百種婦女報刊，這充分證明了知識階層女性在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活躍。通過編輯發行婦女報刊，她們不但創造了女性的公共話語空間，重新定義了女性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更重塑了她們的公共身分：女筆者和女編輯逐漸從傳統的文學意義上的「才女」，嬗變成有現代職業素養和社會性別意識的女報人。她們是活躍在城市公共空間、獨立且有影響力的職業女性。

19至20世紀之交的中國有如一一個剛剛拉開帷幕的歷史舞台——各種反映了不同政見與現代思想的人和事陸續登場：1898年維新派的憲政改良失敗；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猛烈抨擊中國傳統制度和文化；接受現代西方式教育的知識分子

積極地倡導國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現代城市是以上各種變化的發源地和實踐場所。對城市中接受過良好現代教育的階層而言，上述種種變化共同顛覆了儒家思想體系中男尊女卑、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規範。對於那些勇敢地走進城市公共空間的女性而言，追求現代教育和社會生產、參與政治和公共事物的大門正在向她們打開。在主要城市裏，上層、中層以至勞工婦女逐漸在學校、職場、生產領域和婦女運動中嶄露頭角，一些女性活動家活躍在政治、社會和婦女運動中。當城市女性的生活經歷顯著變化的同時，女報人通過編輯婦女報刊在公共領域中倡導男女平權和婦女解放。婦女報刊成為女報人與國族主義、父權制和政黨路線就現代化進程中的女性議題進行角力的公共場所。女報人根據女性的切身需要和面臨的現實問題、國家所行的政策法律，以及她們當時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不斷地重新定義女性的需求和權利、捍衛女性利益，並引導社會朝著對女性有利的方向發展。

中國早期的婦女報刊不僅表現了女性主義的多樣化和複雜性，更提出了重要的女性主義話題。之後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改革開放年代，這些話題始終歷久彌新。即使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仍然受到早期女性主義話語的影響，還在使用先前婦女報刊的讀者們所熟悉的詞彙和語言。本書聚焦於中國的女報人如何在主要城市（上海、東京、北京、天津）創辦婦女報刊、建構女性主義話語，並與父權制思想和國族主義話語就女性在現代社會應有的角色進行辯論。是什麼原因促使早期的知識階層文學女性進入到新聞媒體領域？為公眾閱讀消費（public consumption）而寫作對女性作者意味著什麼？女報人是怎樣編輯報刊，兼容不同的女性主義聲音，並與讀者們互動呢？她們如何與國家、政黨和男性主導的主流媒體進行角力，來定義女性的需求、社會角色和主體位置呢？她們怎樣介紹國內外的傑出女性和各種女性主義思想與實踐，評論與女性相關的社會事件，調解有爭議的女性議題？女報人的社會背景、公共身分和社論立場隨著時間推移有

怎樣的變化？如果新聞業能帶來並促進社會變革，女報人如何通過她們的寫作、編輯、出版和實踐，引導社會變化呢？婦女報刊為女報人和女性讀者又提供了怎樣的公共空間呢？

本書採用歷史學文本分析的方法，從社會性別 (gender) 的角度來研究在國族建設的重要時期 (1898–1937)，婦女報刊的內容及其社會意義。筆者視女報人為能產生社會變化的能動者 (agent)，來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女報人的公共書寫所關注的內容。身處各種劇變中的女報人是如何對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女性問題發表觀點和建議，來引導社會變化朝向她們期望的方向發展呢？婦女報刊又如何與男性主導的新聞媒體競爭女性主義話語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建構新的女性主體位置和性別規範，並將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納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本書不僅研究女報人如何從有政治意識的儒家士紳女性嬗變為現代的職業報人，還關注婦女報刊如何從代表女報人政治立場的政論性報刊，逐漸演變成為關注大多數女性需要的大眾刊物。在歷史流變中，「女性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概念被賦予不同的甚至是充滿爭議的含義，而女報人透過靈活運用國族主義的話語，表達各種女性主義訴求。

本書有三個重點。第一，本書致力於把國族歷史和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以外的女性主義話語融入到中國女性的歷史脈絡中。參與中國婦女運動的女性活動家來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 (liberal feminists)、基督教婦女、女性參政主義者 (suffragists)、女性改良家 (women reformers) 和來自不同黨派的女性。國共兩黨的女黨員只是女性活動家中的一部分。女性主義立場不同的女報人出於共同的女性利益和政治需求，可以跨越黨派、階級相互合作並為彼此的活動助力，為了女性主義目標而結成聯盟。第二，本書關注婦女報刊討論的女性主義議題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的連續性和變化。第三，本書探討早期中國女性主義話語對 20 世紀以降所有中國婦女的意義。作者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常常跨越時空與早期女報人所持的女性主義觀點產生共鳴，並深受她們建構的女性主義話語所啟迪和激勵。

嬗變中的女報人

自晚清以來，政論性報刊成為男性精英倡導強國之策、設想新型政治體制的有力武器。當男性有志之士在政治觀點鮮明的報刊中構想新的國族主義觀念、並傳播與之相關的知識時，女性進入新聞媒體的現象，使得學者們不得不修改他們研究中國社會關係和文化生產機制所用的一些基本範疇。女報人通過編輯婦女報刊，不但公開宣告了她們在公共話語中的存在，而且攻擊了父權思想，倡導民主觀念和新型男女關係，進而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塑造了她們的公共職業身分。

女報人與傳統的文學女性（「才女」）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女報人是擁有公共身分的現代職業女性，而「才女」是運用自己的文學才華為家族利益服務，大多不會有意識地為公共寫作。「才女」是在家庭生活中為自己營造一個文學創作的空間，不會挑戰儒家性別體系賦予她們的家庭角色和女性地位。「才女」們的寫作和出版通常是為了保留女性的聲音，而不是為了改變她們的生活。現代女報人的寫作關注的是宏大的國族問題和女性的切身利益。她們為滿足讀者的消費需求而寫作，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影響讀者並產生社會變化。女報人經常挑戰現有的性別規範和女性的生活現狀：她們提倡女性權利，傳播女性主義觀念，動員女性關心國族大事、參與公共生活、關注女性利益。

在1898至1937年間，為提倡女性主義權益而編寫婦女報刊的女報人背景各異。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社會生活和文化氛圍的改變，她們的群體輪廓在不同時期呈現出多種的面貌。最初的女報人出現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前後，她們大多是倡導君主立憲的改良派官紳的女眷，都接受過良好的傳統儒家女學經典教育。她們被維新派男性提倡的「廢纏足、興女學」、「良妻賢母」、「保國、保種、保教」、「女性從事生產」等與女性生活相關的進步觀念所吸引，熱心地支持戊戌變法。她們勇敢地進入新聞媒體領域，暢談教育領域和家庭生活中應該實現男女平等，並且倡議女性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些精英階層的女報人不但擅長用文言文寫政論，而且賦予傳統的女性文體新的功能。

她們用閨閣體詩詞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識，以列女傳的形式介紹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女傑。¹

從1903到1913年間，在日本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女性成為主要的女報人群體。戊戌政變後，許多支持變法的維新派進步人士流亡日本。留日的女報人或是流亡政客的眷屬，或是赴日留學的女學生。這些女性多數來自官紳家庭，並受過較好的儒家女子教育。她們在東京和上海編輯了多種中文婦女報刊，討論中國女性的教育、職業、婚姻問題，提倡中國女性做有國族思想的「女國民」，並傳播反清的共和理想以及女界革命。她們精通文言文寫作，但也嘗試用白話、地方方言（如蘇白），以及南方的彈詞形式來寫作，以便文化程度較低的女讀者更好地理解她們刊物的內容。在20世紀初，東京和上海的中國女報人主要關注的是反清的共和革命；北京和天津的女報人很多是朝廷官員的眷屬，只能從保皇立場提倡社會改良。北方女報人關注如何強國、開民智，倡議女子愛國、接受教育、經濟獨立和男女平權。她們也批評政治的腐敗，暴露社會弊端和人民的麻木。² 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許多參加辛亥革命的女革命家轉變成了女報人，積極提倡中華民國實現女性參政。這些參政運動者分別屬於多個女性主義觀點和政治目標各不相同的參政團體，她們通常是各團體的發言人。因此民國初年的婦女報刊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並不代表公共輿論。不同的女性主義立場和參政目標阻礙了民國初年的女報人結盟。

從1915年起，接受過現代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試圖用西方的科學民主和各種現代思潮來改造中國社會。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割據的愛國熱忱。1919年5月4日，為抗議巴黎凡爾賽和會將一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轉讓日本，北京的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在五四運動前後的1915至1923年間，新式學校的女學生踴躍地編輯婦女報刊。受西方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影響，女學生在她們的報刊中探討女性在教育、職業、戀愛和婚姻中的平等和權利，關心女子參政權和繼承權。在19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

女黨員和基督教女性都在各自的刊物中宣傳她們的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1924–1927)中，一部分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轉變成為黨派人士。當時兩個聯盟政黨將國族主義定義為反對軍閥、統一全國和恢復主權，將婦女運動定義為婦女參加國民革命。這個時期的婦女報刊在女性主義該如何定義、應優先討論什麼議題上，展現了各種女性主義者之間(國共兩黨的女黨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基督教女性、女性革新派等)的話語競爭。

在南京政府時期(1927–1937)，隨著共產黨在城市中被鎮壓而轉入地下活動，這一時期的女報人多是來自中上階層的、有不同背景的知識女性，如國民黨的女黨員、女基督徒、職業女性、女性革新派、自由主義女性、女教師和女學生。由於當時不少大學開設了新聞系，新聞專業的學術報刊和理論書籍促使新聞工作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接受了良好職業訓練的女報人按照新聞業的職業標準(「客觀性」、「為民發聲」等)來編輯婦女報刊。她們普遍關注女性的社會問題，親自採訪傑出事業女性，調查有爭議的女性事件，調解不同的女性主義觀點。來自不同背景的女報人成為公共事件的仲裁人和女性權益的捍衛者。她們在國族主義和女性主義運動中形成了女報人的圈子，敢於批評國家政策、社會偏見、大男子主義和當時法律規定對女性的各種不公平。

女報人與女性主義

婦女史與女性主義的話語研究不能簡單地依靠男性或政黨提供的資料，因為這些材料既不能反映女性的自覺意識，也不會給予女性主義話語優先權。另外，男性或政黨為女性制定的社會位置(prescribed position)經常不符合客觀現實和女性真正的需要。在政黨動員女性參加政治運動的歷史中，女性從來都不是主角。在男性對婦女問題的討論中，女性通常是被動的，不具有能夠主動產生變化的能力。清末的男性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五四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都曾經在印刷媒

體中廣泛談論女性問題，但是他們的寫作主要是為不同時期的國族主義話語服務。清末維新派男子是為了「保國、保種、保教」而談論「廢纏足、興女學」，並把明治日本官方提倡的「良妻賢母」的女性觀念引入中國。辛亥革命前，男革命家提倡女性參與共和革命和從事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五四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為了建立以西方啟蒙思想為指導的現代中國並實現他們的人文主義理想，提倡中國女性做有平等公民權的「新女性」。192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在國民革命中動員女黨員和廣大婦女通過參加國民革命來實現婦女解放。1930年代中期，在日本侵華壓力下日趨保守的南京政府提倡恢復傳統道德，再次將中國女性建構成守護傳統婦德、正當家庭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賢妻良母。

在哪裏能找到真正的女性主義聲音呢？白露 (Tani Barlow) 認為所有書面資料都不足以直接反應中國女性的生活。³ 那麼歷史上女性在報刊中公開發表的文章，至少可以間接地反映那個時代女性和她們的關注議題。20世紀上半葉的婦女報刊保存了女報人對女性主義問題的觀點和建議，可以做為原始資料讓學者們研究女報人是怎樣建構女性主義話語、提倡新的女性主體位置，並把女性主義理念付諸實踐。女報人的公共書寫表明，她們是通過適應國族主義話語，並與政黨和國家的性別政策角力，來推動女性主義的進程。現存的數百種婦女報刊，向當今的讀者傳遞著20世紀早期的女報人怎樣看待女性與國族的關係、如何對中國社會的變遷作出反應，以及怎樣理解女性作為現代國家的公民應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事權利。婦女報刊的內容也顯示出，女報人關注的女性問題與男性倡導的女性主義話語和女性主體位置時常處於緊張關係，男性建構的女性主義話語不一定適合女性的現實需要。

在西方國家，女性主義是由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倡導的政治話語，旨在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和法律保護。西方女性主義話語通常關注男女的性別差異，提倡女性平等，爭取女性權益。在進入20世紀時，

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和中國女性面臨的現實困境，使得「女性權利」(women's rights)一詞在中國的含義相對複雜，大致有兩種意思：一種是人文主義理解的女性的自然權利和社會經濟機會；另一種是國族主義理解的女性在政治上參與建設現代中國的權利。在西方的女性主義運動中，女性爭取政治權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而在中國卻一開始就是題中之意。對「女性權利」的兩種理解決定了中國的女性主義從一開始就與國族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

西方史學家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關注中國女性的歷史，因為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席捲西方，促使史學家開始研究西方以外地區的女性的生活經歷和男女不平等。受到當時佔主導性的國族史研究的影響，最早的女性主義史學家把中國女性的歷史放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下研究，探索中國女性與政治運動、國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的關係。這些學者發現中國的女性主義服務於國族主義或社會主義，否認中國有自主的女性主義運動。洛克珊·維特克(Roxane Heater Witke)率先研究清末的女性革命家以及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對女性態度的轉變。⁴夏洛特·L·比恩(Charlotte L. Beahan)研究了民國初年的女革命家和女性參政活動家，認為中國女性主義運動與國族利益緊密相關，被國族利益所定義而處於隸屬地位。⁵阿里森·德魯克(Alison Drucker)注意到中國維新派男士和基督教傳教士都將中國女性表述得既愚昧又受壓迫。維新派男士認為他們倡導的立憲改良可以拯救中國女性，而傳教士認為基督教能改變中國女性的生活。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者戴莉婭·戴文(Delia Davin)和伊麗莎白·克羅爾(Elisabeth Croll)研究了中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發現在共產黨成立後的不同時期，婦女的女性主義利益(性別平等、婦女解放)與共產黨的政治需要(階級鬥爭、大生產、社會主義革命)都發生過矛盾，女性利益通常須服從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需要。⁷

在1980年代，一些具有批判性的女性主義歷史學者研究了中國婦女如何在重重權力束縛下生活。菲里斯·安多斯(Phyllis Andors)、朱

中文版序

現代化進程中的女性公共空間

在中國從帝制轉型到現代國家期間，中國女性的切身生活在各方面經歷巨變：廢纏足、接受公共教育、追求男女平等和婚戀自由、以法律知識保護女性權益、爭取女性參政權……在時代洪流的衝擊下，女性生命力的激發與湧現，被記載在各式各樣的婦女報刊之中：1898年戊戌變法，女報人盧翠在《女學報》中請求慈禧太后設立貴婦院，定期選派優秀皇族女性赴海外留學；1905年，清廷終止了科舉考試，張筠籔在《北京女報》上直指孔子造成了中國女性沒文化，應打碎孔子牌坊；1911年辛亥革命，北方有鄭毓秀參加刺殺行動，滬上有陳婉衍帶領女子敢死隊攻打南京；民國伊始，多個女性參政團體的領袖數次向國會請願，力爭憲法承認男女平等和女性參政權；五四運動中，周仲錚在進步報刊的薰陶下，毅然逃離深閨，爭取接受現代教育的權利，並在過程中獲得不少文化領袖和

報人的援助；國民革命中，訓練有素的女兵與北伐軍一起奔赴前線；在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黃心勉頂住審查壓力和左右兩派夾攻，兩次為《女子月刊》復刊……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女性先驅不但探索著女性應有的角色，更因時制宜地提出倡議，重新定義了女性與家庭、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但從清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書寫，幾乎被以男性為主的、宏大的國族敘事模式所主導，女性歷史參與者們的經歷、富於創意的思想和開拓性的社會實踐，往往被遮蔽和掩埋。

本書研究的是自1898年首份中文婦女報刊問世，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期間中國婦女報刊的內容。在細密爬梳北京、天津、上海、東京四大城市的逾百種婦女報刊基礎上，旨在發掘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那些極少被看見、聽見的女性經驗。早期的婦女報刊見證和記錄了那個時代知識女性思想的活躍，和她們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廣泛參與和影響，充滿了豐富的歷史細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本書希望展示中國知識女性在走出閨閣踏上社會的過程中，如何一方面自覺地積極爭取女性的切身利益，一方面主動肩負她們對國族和社會的義務和責任。透過這段歷史的回顧，我希望能讓讀者清晰看見，如今女性的話語與生存空間，是前人一步一腳印、披荊斬棘地開拓而來的。

早期婦女報刊特徵與女報人的多種面貌

婦女報刊是指從人文學科意義上研究和討論婦女問題、反映並指導婦女生活和鬥爭的刊物，不只限於獨立單行的婦女刊物，還包括委託專人或社團主編的婦女副刊（累計期號，但與報社編輯部相遊離），以及一些主要報刊所開辟的婦女專欄或專頁，還有一些非定期、圍繞專門女性話題僅出一期的特刊。所以婦女報刊不止包括主流、最具影響力的刊物（如《申報》的「婦女園地」），更包括很多小眾、較邊緣化的刊物，如1920年代末女學生的刊物《地球》、《覺》，或是女基督徒的刊物《女鐸》和《中華婦女節制會年刊》等。為了擺脫以往被國族論

述和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的框架，本書試圖呈現更為寬廣的女性話題範圍，讓讀者得以看見各種生動的女性故事。

而正因為研究的報刊範疇廣泛，才體現出其獨有的三個特徵。第一，婦女報刊內容多元，女性話語多聲互動，既競爭又對話，此起彼伏。早期婦女報刊的關注點極為廣泛，不僅涵蓋了婦女解放的啟蒙與實踐，以及世界婦女的動態，更從女性立場犀利批評執政當局、針砭時弊。同時，它們也登載婦女文學作品，並積極介紹西方政治思想、宣傳愛國民主運動與抗日救亡。婦女報刊的內容深受其時代背景影響，唯有置於當時的政治語境中方能深入解讀。這也反映了為何多數婦女報刊受政治和經濟因素制約，壽命通常不長。儘管如此，由於各報編者背景、傾向與文化水平的差異，以及所針對讀者群的不同，這些報刊也展現出豐富的風貌：或品味高尚、理論精闢；或新聞性強、富有戰鬥精神；又或文筆雋美、文學色彩濃厚。總體而言，婦女報刊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根據新的現實情況開掘新題材，擴大其關注範圍，逐漸從新聞性過渡到寫實性。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報刊內容的多元和話語的多聲使它們有較大的韌性和生存空間。當政治局勢和文化氛圍劇變時，女報編輯們可以重新調整優先關注問題，改變言辭和語氣，來保存刊物的女性關注。《婦女時報》(1911–1917)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面對1914年5月實施的《新聞法》帶來的出版壓力，《婦女時報》選擇在政治上轉向保守，犧牲了女子參政等進步議題的討論，轉而採用「良妻賢母」的話語，換取了在困境中求存的機會。

第二，女報人群體的背景十分複雜，她們辦刊的目的和刊物的政治傾向呈現多樣性。本書將「女報人」的定義擴展至專業報人和編輯以外，包括了自由投稿者、讀者，還有來自不同背景，卻在共同業餘經營報刊媒體空間的女性成員。我們可以把1898至1937年間的女報人分為三批。第一批是深諳儒家女學經典的士紳階層女性和改良派人士的妻女。她們雖然傳承了「才女」的所學，卻突破家庭局限，將知識用於新聞公共空間，通過巧妙運用國族主義話語來擴展女性在公共

領域中應有的權利。第二批女報人以高度關心政治、投身革命為顯著特徵。她們多為受民主共和天賦人權思想啟蒙的留日女學生，不僅在辛亥革命中建功立業，更成為民國初年參政運動的核心力量。她們積極透過報刊為女性爭取憲法公民權與性別平等，直接挑戰男性在媒體上的宰制。五四運動後，女報人主要轉變為受現代西式教育的大學生和青年教師，多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這些新女性致力於婦女解放，除爭取投票權、勞工權等基本權利外，更積極推動戀愛婚姻自由、公開社交及職業獨立等，力圖建構新的女性典範。隨後，第三批女報人展現出高度的能動性與專業精神。隨著1920年代大學新聞系的興起，新聞工作逐漸成為一門專業。女報人接受了良好的新聞訓練，並依循「客觀性」和「為民發聲」等職業標準編輯婦女報刊。她們不再受限於單一政治立場，勇於發出多元的女性主義聲音，甚至不惜挑戰當時的政黨或國族主義的大論述。她們中既有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成員，也有遠離黨派、在教育和文化領域獨立服務社會的女性。隨著1920年代初基督教在華影響力達到鼎盛，更有不少中國基督徒也活躍於婦女報刊領域，成為具影響力的聲音。

女報人多元的背景，深刻反映了她們對國族、階級、個人、宗教等優先順序的不同理解，也體現了她們在重要女性議題上的分歧——例如，女性應更側重家庭，還是服務社會，抑或二者兼顧，始終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即便在二三十年代政黨主導的婦女運動取得顯著進步之際，政黨之外的自主女性主義運動依然充滿活力。她們各自的關注點也極其多樣：國民黨女報人致力於遵循黨的方針，推動女性參政和法律平等；共產黨女報人則將視野從女子勞工運動擴展到動員婦女參與救國抗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倡導性別平等與女性獨立及社會權利；參政主義者則專注於爭取女性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基督教女性則在強調婚姻家庭的同時，提倡女性獨立與家庭改良；社會改良派女性則注重提升女性教育並倡導廢娼。

儘管意識形態、信仰與階級背景各異，這群女報人仍始終堅守著一個共同的立場：她們立足於女性的切身生活經驗（如纏足、教育、母職等），以此為基點來探討國族、父權制、社會與政治議題。她們的出發點與最終目標都以女性為中心，而非僅為國族服務。這點意義重大，因為它反映出女報人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訴求，經常與國族、父權、政黨對女性的要求產生衝突，更清晰揭示了男性所倡導的女性主體位置（如「賢妻良母」和「女國民」等範本），與女性主義者真正需求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婦女報刊的第三個特點，在於其即便多元，仍能成功匯聚各方力量，共同開闢出一個個女性文化公共空間。婦女報刊具有跨越地域的連結力量，超越黨派、階級和宗教隔閡，將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和其他領域的女性作者、編輯、讀者、學生和工人等聯繫起來，共同營造女性文化，為女界發聲。雖然最早的婦女報刊多由編者纂述，很少與讀者切磋討論，但是從五四時期開始，許多婦女報刊開通了多種與讀者溝通的渠道，如通信、答問、徵文、徵答等，就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徵稿，徵詢讀者對刊物的意見，增強讀者對刊物的信賴和支持。一些婦女報刊不但追蹤報道女界重大事件，還出版專號，集中討論公眾關心的特定婦女問題。圍繞著一份婦女報刊，素昧平生的女性編者、作者和讀者可以共同探討關心的社會問題，介紹和了解女界的現實狀況，彼此呼應，跨地域相互援助。這種交流與互動同樣延伸至編輯群體內部。女報人之間雖有不同觀點與立場，甚至會展開對話和辯論，但這並未阻礙她們相互欣賞、接納，甚至積極為其他刊物撰稿。在國族和婦女運動中，不同背景的女報人也時常團結協作，以女性群體名義參與各類活動。例如，1930年代上海的女性編輯和作者便會定期舉行座談會，分享對特定女性問題的個人經驗和看法，進一步豐富了這個獨特的女性文化公共空間。

從歷史到現在，女性故事該如何被書寫？

本書所收錄的女性故事，觸及了不少在過去和現在都有爭議性的議題，例如不嫁主義、女同性戀、女性自殺等。在新思想已經傳入中國而舊禮教尚未泯滅的過渡時期，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儒家的倫理綱常、父權制家庭和正常社會秩序。這樣的新聞當時滿足了一部分讀者對女性私人生活的偷窺欲，而且大多數讀者並不理解為什麼有些女性會有如此離經叛道的思想和行為。婦女報刊保留了關於這些「極端」思想和事件的寶貴史料，讓我們得以窺見彼時中國女性思想的開放性與複雜性。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在全球範圍內，經濟獨立且行為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女性，亦普遍展現出相似的思維與行為模式，比如明治末期到大正時期的日本。本書討論到的女性自殺事件（如席上珍和阮玲玉），都反映出20世紀早期上海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雖為知識女性帶來新的獨立與自由，同時也殘留著半新半舊的女性對男性的傳統依賴關係。在面對這種新舊交織、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下的股市動蕩、商業媒體炒作等巨大壓力時，女性不但沒有足夠的應對能力，也缺少相關支持，容易走向極端，釀成悲劇。

還有一些故事，則反映了女報人們對這些女性社會事件的報道和解讀，深受其個人女性主義立場影響。她們的報道和評論有可能不是就事論事，而是首要關注事件對婦女運動的整體影響，以及對全體女性生活的正面啟迪或負面暗示，故其觀點可能常與主流媒體相悖。例如33歲的毛彥文為受人尊敬的女教授，本該是女性解放和獨立的最好代言人，但選擇嫁給了耄耋之年的前總理熊希霖。比起跟從主流媒體將這段關係稱為「愛情的結合」，婦女報刊普遍認為熊毛婚姻是對女性解放和獨立的挑戰，認為她並不是為了愛情而結婚，很容易會讓人以為她看上了熊的財產或地位，更可能會被用來嘲諷和攻擊女性解放和獨立的虛假。無論是女性採取「極端」行為明志，還是婦女報刊選擇與主流敘事對抗（儘管立場並不中立），都反映出女性試圖爭奪話語權、重塑女性主體性的努力。

如今，互聯網賦予了電子媒體遠超傳統印刷媒體的巨大影響力，訊息傳播的速度與廣度都無可比擬。但這意味著對媒體的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從本書可以發現，媒體在塑造公眾認知方面具有重要力量；但現今的媒體環境中卻有為博取流量而出現歪曲甚至中傷女性的報道，無形中加深社會對女性的偏見與誤解。我們可以追隨1930年代那些卓越女報人——王伊蔚、沈茲九、李峙山等——的足跡，學習她們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筆鋒。這些前輩敢於揭露社會對女性的不公與歧視，並促使政府正視女性的生存困境。當代的媒體報道除了更多地運用女性主義意識來剖析重大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應當將目光投向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女性，關注她們真實的生命體驗、面臨的困難與提出的需求，用多元而立體的敘事替代「拜金女」、「心機女」等單一刻板標籤，共同構建一個對女性更友善、更理解的媒體環境。

早期的婦女報刊曾是女性發聲、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通過「讀者來信」這類專欄匯聚不同背景女性的聲音，共同營造了女性文化的公共空間。當今的女性已經利用互聯網，圍繞共同關注的議題建構了網絡空間(cyber assembly)，讓女性的生命體驗和訴求引起關注，形成強大的公共輿論，進而推動政策和社會環境朝有利女性發展的方向進展。近年由經歷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女性倖存者發起的#MeToo運動，便是運用媒體連接受害者、爭取正義和維權的有力例證。

儘管媒體發展得非常迅速，當代女性發聲和行動仍面臨巨大的阻力。相較於早期婦女報刊主要應對出版審查，互聯網時代的媒體人可能面臨更嚴格的新聞管控。近年來非政府組織也在中國日趨衰弱，婦聯以外的婦女社團難以生存。即使是婦聯自身，權限也難以向基層延伸，對女性弱勢群體的幫助十分有限。在經濟騰飛的中國會出現「鐵鏈女」這樣的悲劇，實在是社會的悲哀，深刻反映了當前女性權益保障面臨的嚴峻現實。

回顧近一百多年前女報人衝破重重障礙、在公共空間為女性爭取權益的歷史，我希望她們的智慧與勇氣，能為當今女性知識分子和媒

體人提供啟發。只有明白她們當初走過的路，我們才能更清楚知道自己該往哪裏去。

馬育新

2025年5月9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中文版致謝

本書是基於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Cambria Press, 2010) 翻譯並修訂補充而成。自英文版面世的15年間，中英文學界對早期中國婦女報刊的研究取得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新進展。同時，一些主要研究機構和圖書館把中國早期婦女報刊集結成電子數據庫，完成了搶救性的保存工作，使這些寶貴史料能夠以更系統、更完整的形式為全球研究者所使用。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教學和研究中，對2010年英文版的內容和觀點有了一定的反思，也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此，我希望透過中文修訂版，能與各位專家學者以及廣大讀者就早期中國婦女報刊的內容和中國女性公共話語的形成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她的現代史」叢書系列的負責人林驍編輯。在修訂和翻譯這本書的每個環節上，經驗豐富的她都曾經提出智慧、中肯且可行的建議，讓本書增色不少。她的溫文爾雅和細緻周

全，讓我如沐春風，受益匪淺。叢書的另一位編輯陳沅宜女士，做事效率極高、英文造詣很深。她對翻譯過程中的腳注、人名、術語和索引的處理都提出過建設性的意見。也感謝彭騰女士細緻的編輯工作。我何其有幸，能與三位睿智敬業的知識女性合作，共同努力讓本書以更完善的形式與讀者見面。

在修訂和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努力吸收2010年以來中國婦女報刊研究的最新成果，參考了海德堡大學晚清民初時期中國婦女雜誌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¹ 數據庫和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建立的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² 我對英文版所用的史料全部進行了核對並加以補充，努力還原史料的本來面目，以冀捕捉不同時期的女報人的書寫風格和語彙的變化，以及她們書寫的情感效應。在中文修訂版中，我對中國早期女性期刊的出現、發展、挫折、復興和成熟各階段的歷史文化背景做了更多鋪墊和增補，對女報人的生平和寫作背景做了更深研究，以便讀者更好理解女報人的公共書寫的目的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同時，本書增加了大量豐富的圖像，讀者可從視覺上感受婦女報刊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生活的變化、女報人的精神風貌，以及她們關注的女性主義議題的延續和改變。

本書若有不足之處，概由作者承擔其責。希望本書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人士關注研究中國女性早期的公共書寫和女性主義話語。

馬育新

2024年11月27日

注釋

- 1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2009–2025, <https://ecpo.cats.uni-heidelberg.de/frauenzeitschriften/index.php>.
-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 2021, 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index.php#index_mid。